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錚·李大綱 編校

中國近代

學術名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毀園文新編/(清)王韜著. -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6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錢鍾書主編)

ISBN 7-108-01145-X

I. 毀… II. 王… III. 王韜-文集 IV. Z4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98) 第 16016 號

毀園文新編		著者 王韜 責任編輯 潘振平 封扉設計 寧成春 版式設計 陸智昌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東城區美侖館東街二十二號) 郵編 一〇〇〇一〇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		版次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開本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六三五×九六〇毫米十六開 三千冊 定字數 三十一萬字 定價 四十二元 印張 二十八·六二五	
-------	--	---	--	---	--	--	--

編者說明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的晚清編，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

遴選的學者和論著，着眼於學說有新意，有己見，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領域，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

結集則不拘一格，以專題為主，每種或收一人一書，或輯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

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選擇底本，取原校較精的刊本；異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覆核引文，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重施標點，包括分段；編製索引，分人名、書名兩類。

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附於篇前。導言既重可讀性，以助讀者瞭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也重學術性，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為行文簡明，諸導言凡引證出處、攷訂史實或商榷

疑義，均以附注形式陳述。

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晚清編擬分輯刊行，初定每輯十種，先成先印。如可按設想出齊，當能略見系統性。

這套選編，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編輯設想、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鈺組織實施。

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由於種種緣故，長期不克面世。現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

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感謝三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同時期待高明指正。

編例

一、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底本。以原刊為主，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

校勘。正底本排校舛誤，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並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一般不作理校。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以頂注形式見於同頁。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於正文不作改動。

節錄。於篇題下注明，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

標點。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概施以新式標點。

分段。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以便讀者。

注釋。作者原注概從原刊。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謬誤，以頂注出之。

譯名。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如原刊注有外文並有謬誤，則由編者逕予改正。為方便閱讀，若干種書末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

版式。概用繁體字，直排式。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均改為通行繁體字。原作或有雙行夾注，現均改為單行夾注。

索引。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書名兩種索引，以便通檢。

二、本叢書所選諸種，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予以保留，並移作附錄。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

一九九六年五月

導言

朱維鈞

從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滅亡到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發生，這二十年間，清帝國的日子，較諸在前的四分之一世紀，要好過一些。東南的起義烽火漸趨熄滅，西北的邊疆動亂也被平定。美國剛結束南北戰爭，日本才開始明治維新。蘇彝士運河雖已開通，歐洲列強却又在相互廝殺。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不僅再度改變了歐洲的政治均勢，而且暫時減弱了資本主義列強東進爭奪在華權益的勢頭。即使覬覦中國邊疆領土最窮兇極惡的沙俄，迫於野心與實力很不相稱，不得不簽訂交還伊犁的最後條約，承認左宗棠收復新疆是清帝國的內政。

因此，這二十年間，國內人心思治，國際環境有利。依照中世紀式「大亂大治，小亂小治」的古老觀念，清帝國無論在邏輯上在歷史上都有了振興的希望。

事實上，清帝國的統治已有若干改變。隨着一八六一年咸豐皇帝死去，一場宮廷政變使一名不起眼的年輕女人，戰勝了滿族貴族為主的顧命大臣集團，開始了她長達四十六年的獨裁統治。這個女人被稱作西太后或慈禧太后，因為她始終以皇帝母親的身份發號施令。隨着中國最後的這名女主登場，內政外交都有了變化。承認以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家的漢族軍閥的某種地方自治權，促使了「洋務運動」的發展。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終於違反祖制容許各國公使入駐北

京，使清帝國不再通過粵海關和十三行那些相互勾結以謀求私利的官商，而能與西方列強直接對話。一八六七年開設京師同文館，一八七二年成立上海招商局，一八七五年首派大臣出使秘魯，一八七六年首派學生留學美國，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平定回疆，一八八二年新疆建立行省。諸如此類，發生於同治（一八六二至一八六四）、光緒（一八七五至一九〇八）之際的事件，給了帝國朝野上下以某種希望。樂觀者稱之為「同治中興」或「同光新政」。

然而，晚清歷史表明，「中興」也罷，「新政」也罷，都不過屬於皮毛的改變。出身於葉赫那拉氏族的太后，有能力將八旗貴族玩諸股掌，却沒能力改變由一個少數民族壓迫多數民族造成的複雜社會政治問題。建立在滿漢聯合統治基礎之上的帝國政權，有可能在權力分配方面進行調整，却不可能克服中世紀權力結構帶來的基本綱常術法矛盾。愈違祖制而愈遭反抗，愈行開放而愈受非議，這就是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基本現象。

現象固然不同於本質，但本質的顯現必須藉助現象。當那二十年人們都惑於現象，同聲讚頌「中興」，至少承認「新政」效應之時，持異議者當然被視作鴟鵂噪鳴。這些鴟鵂，其實是真的改革者。在同、光之際，他們的人數很少很少，馮桂芬、鄭觀應、薛福成、馬良、馬建忠、陳燾、陳虬、宋育仁等，便是我們可以列舉出的姓名。可是，從馮桂芬以下，這些改革者都是在中國論中國。他們從鴉片戰爭後，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學，並以西方政教為尺度，抨擊國政，呼籲改革。但他們的尺度，都來自耳聞，或有目睹也不過來自上海租界。生於江南，長在上海，青年時飽受西式教養，中年後避地香港英國，自三十四歲至六十二歲，人生最寶貴的而立至耳順的

年華，都在域外度過。由域外看域內，眼光不同，批評不同，對中國的未來估計當然也不同。當時獨具此隻眼者，就是王韜。

壹

王韜，清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十月四日生於蘇州府長洲縣甫里村【一】，初名利賓，學名瀚，字蘭卿，一字懶今。後因上書太平軍，事發遭緝捕，改名韜，字仲弢、子潛、紫詮，號天南逸叟，著作結集名爲「弢園」。韜者，弓劍之衣也，引伸爲懷才而自晦的意思。

韜父昌桂，字肯堂。諸生，舌耕爲生。王韜自稱年少嗜酒，讀書之餘，結社賦詩，觀荷探梅。十八歲爲諸生；次年（一八四六）赴南京應鄉試，雖不中，却藉機在白下眠花宿柳，冶遊無度【二】。可見那時他的家境不菲。十九歲繼父業，在陳墓鎮設館授徒。二十歲娶楊氏，生女。此後三年，蘇南水災，家中「三爲偷兒所苦」【三】，一八四九年，父親忽然病故。「既孤，家益落，以衣食計，不得已橐筆海上」【四】，再步其父後塵，轉爲中國近代第一代以譯述西書爲職業的新式知識分子。

原來，王昌桂於一八四七年到上海，在西人宅中「授經」。次年王韜至滬探親。船入黃浦江，這個開埠才六年的都市的繁華外觀，便令他感到「幾如海外三神山」；繼而同西人接觸，入宅作客，參觀印書，更使他對西方事物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一八四九年夏他父親去世，經主持

墨海書館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數次函邀，他便於同年秋來滬同西人合作。此後王韜述及自己的工作內容，只說「授書」、「授經」、「校書」。實際上，他們父子是在幫助以麥都思為首的「翻譯《新約》聖經委員會」，翻譯中國第一部官話《聖經》【五】。十一年後，王韜離開墨海書館，在香港英華書院，協助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成英文，從西經中譯到中經西譯。理雅各每月付王韜貳拾元。無論在滬在港，傳教士們對王韜都是友善的。

但王韜的心情並不順遂。今存《毀園尺牘》，錄有他早年致親朋故友的多封信函，雖語多文飾，却透露他旅滬通港的頭十七年，始終由於感受中西兩種文化的夾擊，所產生的失重心態。

傳統的士大夫教養，使初到上海的王韜，既不適應英國清教徒那種嚴謹刻板的工作方式【六】，又不甘心放棄出則以文章顯達、退則以詩賦揚名的固有追求【七】。於是，每見大吏，即行獻策。可說是身處洋場，目注魏闕。然而，時不我濟，徒傷命薄。眼見自己的言論化成別人的實踐，他只能嘆為「用其言而棄其人」【八】。

然而與西方神學家朝夕相處，知彼漸深，又不覺形成看人看事的另外尺度，不同於傳統的價值準則的新尺度。因而在不滿西方僱傭制度的同時，王韜又對那些因種種原因而廣集滬上的清朝士大夫，越來越看不慣。儘管他還不敢明斥兩榜出身的昏官貪吏，但痛詆小文人附庸風雅而蠅營狗偷，嘲諷大名士謬託通人而欺世盜名，則時時見於他給至戚知友的書信【九】。

既然夾在兩種異質文化之間，却對彼我兩個世界都不適應，那麼一個在學術界爭訟多年的問題，即王韜是否署名「黃畹」的那道《上逢天義劉大人稟》的作者，從而王韜因此受到清政府通

緝是否冤案〔一〇〕，便不難判斷。那篇文章確屬王韜作品。除以往學者已尋出的證據外，急於用世而不獲所售，同宗基督而謬託知己，慣為博徒而輕於冒險，這樣的錯綜心態，外加當時太平軍雖已內外受挫，但與腐朽的清帝國相比，孰為魯縞，尚在未定之天。因此，似乎用不着從化名考索，也用不着歷舉王韜避地香港後那些自辯如何欲蓋彌彰，但就文章看文章，所獻策略與王韜向清朝大吏的上書，預見相反而思路相同，便可斷定作者非王韜莫屬。兩個口袋裏掏出的是同一貨色。

王韜萬不及料的是他在關鍵時刻押錯了寶，而他在二一八六一年冬給太平天國蘇福省行政長官的稟帖，次年夏天便落入清軍之手。當時上海的治外法權還在襁褓中，雖有英國駐滬領事和傳教士庇護，王韜身居租界也難逃清朝地方當局的緝捕。於是他不得不拋妻別女，將圖書財物託付給前妻兄長，便倉遑登輪逃往英國的新殖民地香港。

王韜到香港後便改名易字〔一一〕。那本是傳統的文人積習。改名為韜，字仲弢，原寓良弓在囊中等待主人取出使用的意思。〔一二〕沒想到他指望的主人，湘軍頭目曾國藩早死，淮軍頭目李鴻章遲至二十年後，才因他已在香港辦報成名而表示願羅致人幕〔一三〕，堪稱晚清首例「出口轉內銷」。

當清帝國賴以鎮壓太平天國的漢族軍閥，憑藉繳獲的黃曉《上逢天義劉大人稟》原件，而緝捕王韜並迫使他逃亡香港的時候，他們沒有料到此舉給中國造就了怎樣一名真正「知時務」的人材。即使王韜本人，當他化裝爬上洋輪駛往香港的途中，也絕沒想到不過五年後，他居然能在當

時西方世界最高學府牛津大學發表討論中西文化優劣的演說，並在愛丁堡大學參觀時被稱為中國「學士」【二四】。

王韜與倫敦教會聯繫，但因他在著述中並不袒護教會，對天主教還時加批評，加之一貫的江南名士作風，詩酒高會，冶遊無度，憤時嫉俗，顧盼自雄，曾與寶山蔣敦復（劍人）、海寧李善蘭（壬叔）並稱「海上三異人」。因此人們常以為他是傳統士大夫者流。現在有確鑿的證據，表明他是一個受洗基督教徒【二五】，儘管基督教思想確實沒有改變他什麼。這個矛盾現象，是晚明基督教再度入華以來士大夫信徒的老問題。它說明兩種文化的互相吸收轉換過程是多麼艱難。改宗皈依基督教，並不意味着同自己的文化傳統實行決裂。信徒再度虔誠，所受教養的影響和環境的拖累，也不可能一朝改觀，那怕是一個翻譯了《聖經》的人。一個相關問題：王韜是否通英語？據查證，他的英語不敷應用【二六】。這對與英國傳教士相處幾十年的人來說是奇怪的，但也可見當年士大夫對外國語言文字、文化傳統的態度。

離開上海到香港，王韜便受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聘，合作翻譯《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s*），從一八六三年起，相繼完成了將《尚書》、《詩經》、《左傳》、《禮記》、《竹書紀年》等譯成英文的工作。時值同、光之交相對平靜的年月，又遠離內地的政治漩渦，王韜的用世熱情被壓抑下來。「閉門日多，罕與通人名士交接。」【二七】一八六七至一八七〇年，應理雅各邀，王韜離港赴歐，至蘇格蘭助譯《易經》。途經意大利、馬賽、里昂、巴黎。在倫敦遊覽，在牛津演講，會見了威妥瑪、李泰國等朋友。在杜拉（Dollar）見北極壯色，工作間隙訪愛丁

堡、阿伯丁、格拉斯哥。此行在清「蒲安臣使團」初使泰西之先，作為「訪問學者」，王韜也是清末第一人。異國的風土民情，固然使他大開眼界，而剛經歷工業革命和實行自由貿易的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留給他的印象更深，同時他和傳教士、外交官、漢學家有良好的私人關係。這使他在二一八六七年返港後所寫的《漫遊隨錄》，在同類作品中最為真切細緻。

一八七二年，理雅各退休回國，王韜和黃勝傾其財力，加上朋友資助，用一萬銀元買下他的倫敦會香港印刷所（L. M. S. P. HK）創辦第一家華商出版社：中華印務總局。隨後，在洪士偉、伍廷芳、胡禮垣、何啓的協助下，王韜自任主編，創辦第一份華字日報《循環日報》，和上海《萬國公報》、江南製造局周圍的變法人物遙相呼應，形成一種改革輿論，影響了嶺南和江南的青年一代「二八」。而王韜也實現了角色轉換，以「學貫中西」的知時務名士的面目，重新引起人們注目。一八七一年，他編譯出版的《普法戰紀》，在國內和日本都引起轟動。那時曾國藩便想羅致他人兩江總督幕府，因曾於次年病逝作罷。一八七九年，寺田宏、重野安繹、岡千仞、龜谷行等一批日本名流，邀請他訪日兩月。行程中兩次途經上海，受到盛宣懷等的接待。在日本，又受到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等的殷勤照拂。這都表明他在清政府官員眼中已不再是「逆犯」，而是必須結納的在野聞人。這次旅行，留下一部《扶桑遊記》。

從日本旋港，王韜加緊謀求回滬的努力。此事遷延十數年（一九），最後得到李鴻章出面，致函上海道馮竹儒：「昆山王君，不世英才，胸羅萬有，淪落香港，殊為可惜。執事能為我招致，不惜千金買駿骨」。（二〇）有此安排，王韜終於在一八八四年重回上海。受到上海的新派人物的

推重。格致書院選舉他為掌院；《萬國公報》聘他為特約撰稿人；《申報》則聘他為編纂主任；唐景星、鄭觀應還在招商局為他造冊，掛名支取生活費〔二二〕。一八八五年，自辦木活字印書館「弢園書局」。〔二三〕有三件事可以代表他的時代地位：一八七九年春，在上海，鄭觀應攜《易言》（《盛世危言》前本）來，求序於王韜；〔二四〕一八九五年，英商漢璧禮回國，捐銀六百兩，委託廣學會以《何為當今中國變當務之急》為題，徵文全國，王韜任評委主任，給了康有為末獎；〔二五〕一八九三年，經鄭觀應（一說陸皓東）介紹，孫中山得以拜見王韜。王韜親筆為孫修改了《上李鴻章書》，推薦到《萬國公報》發表〔二六〕。一八九七年，老病逝於城西草堂〔二七〕。

貳

王韜是近代第一批的職業文人。他靠當編輯、翻譯、報人、出版商和流行文作家謀生，儘管他對此仍感自卑，但對自己能留下如此眾多的著作，暗中還是得意的。據《弢園著述總目》稱：六十歲前，已刻未刻著作三十六種；另《弢園老民自傳》列五十三歲前有二十六種，其中四種不見於《總目》，勉強合於他六十三歲時《序〈劍華堂續罪言〉》一文所稱「四十餘種」。〔二八〕王韜晚年急於自編全集，說是「深懼一旦湮然，平生著述，必為人拉雜摧燒，」其實是隱然以當世孔夫子自許，「蓋懼沒世無聞」。〔二九〕

然而還有本人未登錄的著作。據柯文查，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藏有《周易集釋》、《禮記集釋》、《毛詩集釋》，這是理、王兩人合譯《中國經典》的副產品，未知從何途徑流到紐約。【二九】王韜返滬後爲各報撰稿，在一八九〇年十月至一八九四年一月間，每月以「天南遯叟」等名，在《萬國公報》發表一篇論文，其中有轉錄自《張園文錄外編》的，但亦間有新作，名篇有《救時芻議》、《擬上當事書》等。初步查考，計有十七篇，還有其他散見論文。王韜早年在上海記了十二年日記。上海圖書館藏有《蘅華館日記》稿本，起一八五八年，迄一八六〇年；另有始於一八四九年六月的同名和異名日記，今藏於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兩處合璧，尚缺一八五五年春至一八五八年冬的部分，很可能便是三十年代毀於《新聲雜誌》印刷所火災中的那一部。【三〇】

王韜的著作可分爲兩類，著名的時論確立了他改革思想家地位；大量的筆記小說遊記被認爲具有文學價值。但他的理想是「少爲才子，壯爲名士，晚年當爲魁儒碩彥」。【三一】就是說越到晚年越希望人們承認他確是如孔夫子那樣的當世聖人。【三二】不幸他也犯了中世紀儒者的通病，希蹤孔孟，露才揚己，適足以顯拙。王韜周遊歐亞，見聞廣於當年聖人何止百倍。長期與西方學者合作互譯中西「聖經」，於華洋之「禮」皆能言之，儼作「孔耶異同論」或「朱（熹）加（爾文）二子相通說」之類，定能激起轟動效應。然而王韜竟欲與乾嘉漢學諸老爭勝，踢翻在前的毛奇齡，跨越在世的王先謙，適足以揚短避長。不過王韜又是聰明的，他雖宣稱《張園經學輯存》已成六種，却說「經學諸書，卷帙繁重，無力付梓，容俟異日」。他雖宣稱早已著成《張園文錄內編》，「多言性理學術」，不待說其中精義遠勝於「國朝」漢宋諸儒，却又嘆息「辛酉冬間溺

於水，一字無存」。^{〔三三〕}

沒有被一八六一年寒冬冰下之水吞沒，而又有有力付刊的，只有「多言洋務，不欲入於集中」的文章，結集「曰《外編》」^{〔三四〕}，這是從《循環日報》上的文章和多年積稿中彙輯而成。據說校對無學，非但「字多舛謬」，而且「前後編次都未允當，尚待重訂」。編次真的有問題。主要問題是不按結集慣例，論時事而不注出處，作序跋而刪除紀年，求體系而錯亂作序，示一貫而增刪舊文。比較容易識別的是那些社論、時評作品，法事、俄事、越事、台事、琉事，雖不著寫作時間和出處，但參照有關歷史記錄評蹤辨迹，却顯示此人到底諳熟「夷情」，通曉世事，見多識廣，頭腦遠比帝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那班親貴大臣清楚。他對當時國際國內重大事件的分析 and 判斷，也出於同時代一般學者之上。因此，他雖自以為這些「言洋務」的文章難以傳世，而歷史却恰好證明這是在中國近代思想界留下的最有價值的文獻。

《弢園尺牘》、《弢園尺牘續鈔》像是經過潤色的作品。其實王韜時常把尺牘作條陳，「與人書，多談時務」。^{〔三五〕}這就使他的信函便多具政治史和文學價值。

《普法戰紀》是王韜最爲得意的著作。由流氓皇帝拿破崙第三愚蠢地挑起的這場戰爭，它的進程和結局對於十九世紀後期的世界歷史影響那樣劇烈，致使那時歐洲最傑出的學者都被吸引而紛紛討論。王韜的著作，較諸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雨果的《小拿破崙》等名著，不啻小巫見大巫。但作爲東亞文士，居然在拿破崙第三色當戰敗伊始，就寫出有史有論的這樣一部書，在香港出版，其中甚至夾有巴黎公社的信息。這不能不說是晚清中國學者認識世界